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觀念建構

鑒於「歷史的編組、闡釋，與文化理念呼吸相通」¹，本文乃透過對中國及大一統思維之溯源，意欲重塑大一統的實像，再順此繼續審視中國與台灣關係的建立與延伸。誠然，台灣不是無端捲入中國，更非單一因素之操作與連結，而是無數個內外因素紛紛交政於中國，有需求、有矛盾、有衝突，有期許、有爭戰、更有同根意識等不同階段與反復過程，其中涉及跨海洋之時空整合與中西觀念之糾結。這錯綜複雜之歷史，非僅狹隘從台灣的主體角度觀之，必要理性思考整個中國的進程，也惟以進程之微視，才得以宏觀中國之大一統，並總括以論中國之一統現象。

一、有關天下、國家、中國與大一統之命題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人一直把自己的國度當作世界的主體，²又以人倫關係的逐步擴大建構其政治社會組織，³所以有「家國天下」一體論及「天朝上國」之稱。若以西方國家的角度觀之，其實中國早自周朝即已有早期國家的雛形，而春秋戰國時更已有了國家概念，稱之為真正國家，但當時形同獨立之諸侯國相互爭霸，仍是以天子為目標，因而天下名分成為統一的標幟，⁴換言之，各國名為國卻志在天下。很顯然的，此時國之位階在天下之下，也不等同「中國」，故有所謂之「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

¹ 許倬雲，「文化記憶與歷史」，聯合報，(台北：聯合報社，第39版，2002年3月29日)。

² 馮天瑜，「中國古代文化的類型」，收編於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年)，頁18。

³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30。

⁴ 尤西林，「有別于“國家”的“天下”」，學術月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期，1994年)，頁21。

稊米之在大倉乎」⁵因此，國、中國、天下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各屬不同意涵，也各自背負不同的時代演變。再深入探討，中國初時雖無有形的國家論，但在當時天下觀的運行下，有其超乎西方國家的凝聚力，只是天下是泛稱而非專指，遂另興代表性名稱之轉換，而得中國之轉進。

由於天下與中國常出現於古籍，天下其義已定，而中國卻呈多面向意涵，有京都、國中、中原諸夏、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等，諸此基本上皆可歸諸為處在四方蠻夷「中」的文明之邦，⁶再窮其根抵，「中國」所代表的更可謂為浩瀚且優質的中國文化，它優於邊陲地區及化外地區。⁷這種以文化邊界而非變動的領土界線限定的中國國家概念，⁸再歷經「合異以為同」⁹的混一過程，漸取代天下，形塑了「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¹⁰，其間或因「散同以為異」¹¹所進行的武力統一作為，共而建構中國「大一統」的歷史進程。

大體而言，從春秋戰國之際（475BC）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後（1842）延續達兩千三百一十七年之久，中國皆非「國體中國」而為「文化中國」，這文化中國仍是一廣泛的概念。其後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普世觀開始受到嚴峻的挑戰，漸而朝「國體中國」轉化，並擴大成為世界的「中國」。也就是說，中國人在西方勢力的衝擊下，已無可規避的必須調整其普世天下觀，遂很自然的將無形且悠久之中國文化融入有體之國家，亦即將政治中國融入文化中國裡，終而成就「中國一家」，而以中國總稱。從「家國天下」到「中國一家」的過程中，中國的歷史是延續的，文化也未曾中斷，中國的疆域更自夏、

⁵ 莊子·卷6下·秋水第17，頁563-564。

⁶ 王明珂，「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失憶」，歷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頁35。

⁷ 唐律疏議對於某些犯罪有「化外人」與「化內人」的區別。化外人所居的領域是化外，化內人的領域則是化內。所謂「化外人」即「聲教之外，四夷之人」的解釋，化外地區的文化與中國不同，以「化」區辨內外，其文化的涵義已明顯。中國作為一個文化的團體，而以教化為職責，的確是中國的國家型態之一。引自甘懷真，中國通史（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72-73。

⁸ 周慶智，「試析先秦“大一統”民族觀」，雲南社會科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第5期，1992年)，頁63。

⁹ 莊子·卷8下·則陽第25，頁909。

¹⁰ 傅偉勳，「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13-14。

¹¹ 同註9。

商、周三代一路下來，慢慢地擴大而始有今天。¹²也就是說，中國即便在種種原因之下暫呈分裂，但文化卻在中國歷史上延續著，因而疆域的變化和大小無損於中國的恆久一慣性，故以疆域、朝代、或分裂等因素切割中國，將無法普遍性合理解說中國的歷史進程。由此可證，中國非一般國家類型中之一個國家，而是超國家類型的。¹³它一方面是一種文化形態，另一方面則是政治上的一個主權國家範疇。¹⁴這雙層意義的中國對中國人有著完整且內化性的影響。

二、有關大陸型大一統與海洋型大一統之命題

中國有其屬於非國家之文化層面、更允其一再演變、擴大與沉澱，才凝聚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之浩瀚。這浩瀚的形成，其取決關鍵不在分裂與統一的時間長短，更不是次數多寡等數字統計而已，而是存續其間的大一統思維。所謂「大一統思維」，即「強調」一統的思維。這一統又為何？從春秋經，公羊傳，到董仲舒的闡釋與後人的逐次詮釋中，一統的定義一再反映出時代的面向，由奉正朔、到夷夏、再到天人之一統的融合，一統的政治型態，也從封建一統轉為集權一統，再到民族一統。重要的是，這大一統的規模雖歷經時代的轉折而迭變，然其間仍有其不變的原則，就是它乃立基於夏商周一脈相承的政權體系，並蘊涵中國文化中的「一」、「壹」、「均」、「安」、「同」、「和」、「不二」等的類似一統觀念，也唯此文化的實際存在才使中國續為中國。

再細究中國歷史進程，自西周統其當時中國之凡百氏族，中國即可謂出現政治上的一統，¹⁵而歷經春秋戰國的長期分裂，秦所開啟的更是社會群體期待已久的大一統局面，其後復由漢確定此大一統路線，使成為一必然規律。因此縱其後之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或之後隨唐之一統，及五代十國之小分裂，宋

¹²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修訂8版)，頁156。

¹³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頁19。

¹⁴ 魯凡之，中國發展與文化結構，(香港：集賢社，1988年)，頁449。

¹⁵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05。

的整合，旋即又是統中有分的現象，北方有遼、金，南方有南宋，再到元、明、清之一統，其間甚至包括二次異族之主政，這諸多分合之間總因大一統思維的牽繫，致中國文化未受影響，而少數異族為貫徹其政權之一統，更只能囿於中國文化中求其政策之調整，結果反為中國文化所同化，盡入中國大一統之軌轍。在此波進程中，多少的化外邊陲地俱遞次進入中國，使中國得為一大國，而且此大一統亦均只在中國本部或被視為陸地延伸的近海島嶼進行，故稱之為「大陸型之大一統」。然而明清以降，先是荷、日、西交相入侵，台灣漸而躍起，其後復因中國內部政權對立，在荷、鄭、中的三角關係中，台灣再轉為中國分裂政權的海外基地，由是一統的觸角遂開始伸入太平洋邊陲的台灣。嗣後，又在海波不平的考量下，清廷乃暫置過去墟地的海防策略，轉而考慮將台灣納入版籍及建置，從此開啟所謂「海洋型大一統」。

在本質上，歸屬對中國來講一直就是政治意義大於一切，台灣歸屬中國當無任何例外，表面上它應列屬海洋型大一統模式，然在實際操作上卻仍無法突破大陸型的傳統思維，換言之，清廷一開始並未真正理解大一統的轉折，當然也就不曾思考大一統觀念的調整，僅以陸權思維看待台灣，將台灣視為中國邊陲之一，說得更貼切或更現代化一點就是根本未重海防。正因此故，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的治理，清廷的重點顯然不在開發，而是擺在會牽動其政權鞏固的人員遷移與物資移動上，故屢次「申嚴海禁」，且屢禁屢鬆，反覆無常，¹⁶遂而形成台灣的畸形社會結構，結果衍生迭起的民變與械鬥，如此逐步深化台灣社會治安問題的具體病象，¹⁷故又動輒衝擊清廷政權，最後清復拗不過內地之人口與糧食的壓力，¹⁸乃緩步開展兩岸較不消極的發展模式。這緩步的情形直到 1860 年代一連

¹⁶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 21-22。

¹⁷ 劉玲妮。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9)。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

¹⁸ 有關人口壓力問題，早見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命廷臣會議蠲免天下錢糧的諭旨中：「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於今 67、8 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到了五十二、五十三年(1713-1714)之際，人口問題更成為康熙帝縈繞於心的憂慮。引自張研，18 世紀的中國社會，(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年)，頁 33。

串的外國要求締約開放通商口岸，才有另一種較快節奏的因應，即清廷此際真正體悟台灣戰略地位及其對中國大陸東南邊防的重要性，並採取一連串較積極的突破作為，如建省，去除番界，兩岸人民往來不再設限等，由是台灣乃得以積極開發，並總此勾勒出海洋型大一統的曲折模式。

綜此大陸型大一統與海洋型大一統，其實二者基本上皆以大陸為本體，其大一統觀念並不分裂，¹⁹一統俱為其終極理想，只是後者多了國際海洋性的影響與介入，故漸而起了積極動力，這全然不同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海疆開發，它多了經濟層面的考量，而非僅及於附帶防禦觀念而已。歷史沒有單獨的事實，也沒有偶然的境遇，一切並非靜因產生，它是不斷向前進的，從大陸型一統走至海洋型一統，更呈現出歷史的因果鏈。

三、有關台灣、中國與一統之命題

海洋型大一統的開啟既已確定，它原則上必然有著固定之一統軌跡，但在實踐中其曲折卻又勢所難免，尤其兩岸之間有海的區域隔絕與文化差異，有中西觀念的激盪，故兩岸間有沒有可能因海洋的界面衝突與國際利益的縱橫，突然脫勾，為此，得再由人文觀之。

首先，台灣之所以納入中國海洋型大一統的發展，除地緣論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的中國人文建構。此地緣與人文之間都是自然因素的累積，縱使地緣可以分割，人文建構卻非單一因素主觀形成，更難以從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強加撕裂，既如此，任何以截取文化片段，硬要肢解整個建構體，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嚴重甚或動搖台灣原本賴以立基或生存之動力。然而，台灣為求自立，把自己極大化的類比於世界獨立建國的案例中，硬生生地尋求海陸文化斷層之藉口，其犖犖大者如：

¹⁹ 于汝波，「儒家大一統思想簡議」，齊魯學刊，（山東：曲阜師範學院齊魯學刊編輯部，第1期，1995年），頁52。

- (一) 質疑中國一直要到清季才算一個國家，²⁰而台灣早在明末即明確出現，卻仍未有所歸屬；
- (二) 強調台灣與中國自古無所相關，非中國屬地，²¹故中國之清廷係殖民台灣，中國大陸也未嘗一日統治台灣，而曾經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也僅為外來政權；
- (三) 以比較台灣過去曾受統治時間的長短，把荷蘭、西班牙、及台灣建省後日本的殖民佔據與中國之統治等量齊觀；
- (四) 提出台灣曾為中國化外、或曾遭清廷二度棄留、或於清廷統治其間民變與械鬥特多，以強化中國殖民的事實；
- (五) 擴大解釋清廷治台之反覆嚴弛政策及其番界之分的內外之別；
- (六) 既然新加坡為華人國家，台灣又何嘗不能自為一世界所承認的國家？
- (七) 將一切有關中國之論述與進程皆歸類於封建思想等，以此揚棄與中國的一切文化共構。

諸此片面理由，都有其經不起驗證之處，蓋其俱為中國海洋型大一統之進程，而此海洋型又是對大陸型一統的承繼與發展，更是中國的總體呈現，無此則缺乏辯證，難以說明「自古不屬中國的海外丸泥」，如何在不期而遇的多方運作及相互需要下進入中國。

另者，再以前述之「台灣非自古即屬中國而自棄一統」而言，其實它尚存在許多相關歷史文獻的爭辯，本文無意從此辯駁，乃針對中國大一統文化的歷史進程來論。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是事實，但如果以此否定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基本上立基相當薄弱。其因乃在中國大一統的過程中，不只是台灣，還有其他許多中國的領土，都是自古非屬中國，但這並無損於日後台灣與這些地區併入中國軌跡

²⁰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33。

²¹ 詳見甘為霖 (Campbell, Wm.) 譯。荷蘭人佔據下的台灣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p27 所譯，荷蘭於1607年間與清廷官員之交涉內容：「He added that, if we wished to go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o fortify ourselves there, the king would have no objection.....」。

的事實。就台灣而言，其有屬於文化上的「家族文化」、「夷狄差異」之文化主義（culturalism）²²，亦有屬於政治上的明鄭一統之爭所累積的中國認同，更有屬於地理環境上的地緣及交通等因素，加上國際的推波助瀾，彼此相互糾纏。如此複雜的交集，要使台灣維持其原始風貌，非台灣之期許，要自成一體，也屬不可能。另拿荷蘭據台 39 年（1624-1662）來論，其時間不可謂短，其間荷蘭對台灣有其正向發展，如墾殖土地、開發物產，及文化方面的綏撫高山族、宣傳耶穌教、用羅馬拼音山地語等。²³這些都使荷蘭極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但情形恰未如是。蓋殖民國的優勢，係來自於其在殖民地所擁有的特殊社會結構，如果它無法將此相對的優勢轉化成十足的統治地位，就很難開發更廣闊、更有保障的前景。²⁴荷蘭正如是，它依賴漢族墾拓台灣，使漢族日益增多，卻因中西文化差異太大，在缺乏文化的根基下，或有謂漢人之從中作梗，始終無法孕育漢、番、荷相融的文化背景，反逼使漢番興起驅荷的念頭。然而無論作梗、共同驅荷等，若無一定的文化架構，其力怎足以凝聚而為行動，且這些念頭，不投射他國，卻偏偏集中在中國大陸，終而寄望於與台灣漢族有關聯之鄭芝龍之子成功身上。這樣的連結，不可不謂之自然的思維，毫無任何牽強，此即本文所欲彰顯之「大一統的歷史進程」。

因此，縱無荷據台灣，就當時國際情勢對中國之覬覦，難保日、葡、西、美等國不會旋踵而至，這一來台灣的地略將益形重要。在此發展下，可以推論出台灣也勢必捲入中國之歷史進程，形成另一種海洋型一統文化。總之，台灣之於中國既有分合史的歷史記憶，也有人文的深層結構，它無法由任一政權假政治作為獨自操盤，單單強調台灣四百年的歷史，這有違中國大一統的行徑，也不符歷史的定律。

²² 所謂文化主義，指中國人對其生活方式徹底忠誠的情懷。參見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21。

²³ 林熊祥，台灣史略，（台北：青文出版社，1977年），頁17。

²⁴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 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貓頭鷹出版，1999年），頁346。

第二節 研究發現

本文透過大一統的區隔，逐步證諸大一統思維由大陸本土擴展至台灣島的過程，旨在澄清清據台灣後態度消極的核心原因，而所關注的仍在台灣之本體與中國之未來。有關於此，多數學者大致作如是之論述：

滿清政權統治台灣二百餘年，採取的都是「防台以治台」的政策。為達此目的，清朝長期實施海禁政策。因此台灣島上形成的漢人移民社會，全然沒有得到政府力量的協助，而是一種自發性的發展的民間社會。²⁵

這種將滿清等同荷、西、日皆併為「殖民史」強力區隔中台之關係，顯然有意忽略大一統歷史進程的人文因素，而如此之推論，只在凸顯台灣問題，既未能論證事實之緣由，也徒增分歧台灣與中國連結之因子。像這樣的敘述，根本無法解決兩岸問題，更無益於台灣之發展。但若太強調大一統，未理解時代的差異性，兩岸也將陷入歷史的死結，毫無前進，殊不知大一統的歷經轉折，正代表其有時代性的特徵。明乎於此，中國之一統才有建設性。

因而，從此角度探析清廷消極的態度，自然多一份包容性，少一份厭憎性。在這方面，首先應澄清的是大陸型大一統是在中國人傳統文化的既成勢力氛圍下，包容和同化的，²⁶要無此思維，清廷怎會一再侷限於內陸之發展；於此更須反思明鄭降清後，清何故未棄台？這若無台灣已為漢民所拓墾，或非台灣近中國的邊防地略，康熙帝怎會就此扭轉觀念；而且，最重要的是台灣要非漢人移民地或潛藏之中國一統思維，絕不會在鄭成功驅荷時，台民包括漢族和原住民奔走相告，揭竿而起，不是為了抗荷獨立，而是支持同為漢族的鄭氏政權。同樣的施琅入台亦未遭到激烈反抗，這些都足徵台民對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認同。至若清廷建置後，對邊陲地區開發的遲緩，這不只在台灣，即便是中國內海、被視為

²⁵ 陳芳明，「台灣研究與後殖民史觀」，歷史月刊，（第 105 期，1996 年 10 月），頁 44。

²⁶ 中村元著、林太、馬小鶴譯，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台北：淑馨出版社，1999 年），頁 222。

中國陸地延伸之海南島亦如是，此乃關乎思維。在中國數千年來均秉持大陸型之一統思維，當然一時之間難以擴步西方民族的海洋觀，形塑其較積極之海洋型大一統。在過去，海洋觀念未開之際，明清最多還僅以「墟其地」以為防海盜之消極方法。相較於此，台灣在建置後的過程中，從一府到一省的 202 年間，自然充滿著政治的不當施行與控制上的矛盾與衝突，也就不難想像。但若回溯秦漢一統，當其時進行大陸型一統之際，亦出現無數之紛爭與分裂，這何嘗不是消極的歷史進程，而最後卻又總結為中國之大一統。就台灣而言，倘無海洋型大一統思維的開啟，台灣島又何以由建府到建省，其發展甚至比在清初即踏襲明制分為一府三州十縣的海南島還要快？²⁷所以本文藉大一統思維的海陸進程，非為澄清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藉口，而是要以歷史的因果鏈具體釐清大一統的自然演進。

迴避歷史，終將作繭自縛，也無法磨滅大一統的事實存在，是以肯定中國與台灣的关系，既無損台灣的存在，談分裂的事實，也更將鞏固台灣的地位。正視歷史而後，接下來就是要如何順勢創造雙贏，使台灣不虞被邊緣化的可能，中國大陸也不憂台灣的主權獨立化可能動搖其國本。在此，不妨再審視整個中國大一統的政權表現，過去它既可因封建一統未能解決統一過程中和鞏固一統中已經碰到和將要碰到的一系列問題，而轉為集權一統，然其後在集權的運行中，它亦無法強力調整和維繫各階層的關係，²⁸滿足社會的期許，遂再遭唾棄，故臨此民主分權的時代，當仍有其可創造性的積極轉化空間。這個轉化的模式有可能依舊踐行海洋型之大一統，或另成更積極的「中國一統」模式，唯此必要堅持一先決條件，即一統絕非為阻礙中國而存在，它是建構在中國文化的新取向上，²⁹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活化新世紀中國。

基此，本文乃在此結論中，預先申述一個遠景，即目前兩岸種種之政治運作與意識型態的切割與分裂，當只是分裂政權在一統過程中之策略，而非分離空間

²⁷ 參見小葉田淳著，張迅齋譯，海南島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頁3&194。

²⁸ 朱大昀，「以荀子論秦看兩種不同的“統一觀” - 兼論荀子政治思想的特色與歷史地位」，中國哲學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期，1984年)，頁47。

²⁹ 殷海光選及編輯委員會，殷海光選集，(九龍：友聯書報發行公司，1971年)，頁542。

的正式建構，這對兩岸的發展或者說中國的未來也未必全然不利。至若，將來一統有無具體的分界點？其起因是經濟、國際或其他因素？當猶待歷史的演繹。